德國漢學與美國區域研究的歷史交鋒

The Historic Encounter between American Area Studies and German Sinology

許惠貞 (Sheu Huey-jen) *

一、前言

20 世紀初的德國漢學研究仍屬於幼年時期，但當時學者福蘭閣 (Otto Franke, 1862-1946) 已提出漢學應該注重兩方面，一方面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研究，另一方面是當代中國問題和局勢的分析，此觀點在當時以古代中國為研究主流的漢學界是相當特殊的看法。1950 年代慕尼黑漢學創系主任海尼士 (Erich Haenisch, 1880-1966) 曾與福蘭閣之子、也是漢學家的傅吾康 (Wolfgang Franke, 1912-2007) 展開漢學古今之辯，前者視中國為一古老文明，後者則努力尋找現代中國、現代歷史及當代中國發展的軌跡。這樣的辯論在當時並未造成廣泛的迴響，只是被視為漢學家個人立場的殊異。¹ 到了 1960 年代，學生運動風起雲湧，古老神秘的中國一夕之間成為現代革命的先驅，在世界政治上的重要性日增，以鑽研古典文獻為專業的大學漢學系首先成為德國各界質疑的標的，認為以傳統漢學知識想要了解當代中國，無異是緣木求魚。而對當代變動中國迫切認識的需求，促使新舊漢學的切割辯論正式展開。

這樣的傳統漢學、現代中國研究的辯論，除了來自德國國內的反思之外，也受到來自二戰後美國的當代中國研究風潮的影響。美國早期漢學研究與歐洲各國一

樣，以傳教事業開始，經過商人及外交官員的共同參與，而發展到「東方學」(Oriental Studies) 的學術領域。但在二次大戰期間，美國因參戰需求，發展出掌握當代東亞國情文化的新方法，統稱為「區域研究」(Area Studies)。這種以掌握當地語言及知識的研究法，不僅與傳統的東方學的研究領域有所重疊，也因其標榜應用多種社會學科的研究方法，而與社會、政治、經濟等社會學科產生學科主從地位的爭奪。當時現代中國研究也被納入「區域研究」的一環，或者說美國的中國研究模式就是「區域研究」。²

「區域研究」在二次世界大戰後以強大的財力做後盾，在美國各大學內成立專屬的課程、研究機構及組織，並且在世界各地以獎勵資助的方式推展類似的區域研究計畫。美國「區域研究」在戰爭期間為美國政府立下的汗馬功勞及戰後強大的財力支持，即使面臨其他社會、人文學科的挑戰，並未對其在大學中擴張的趨勢造成阻礙。這波新學科的風潮在前進大學發源地、重視學術傳統的歐洲時，是否也能勢如破竹、在眾學科爭鋒間獲得壓倒性的勝利？本文將以冷戰時期美國區域研究對德國漢學界產生的影響管窺歐洲大學學術傳統在美國學術風潮的衝擊下的反應。

* 作者現為臺南大學文化與自然資源學系專案助理教授。

1 馬漢茂，〈德國的漢學研究：歷史、問題與展望〉，《德國漢學：歷史、發展、人物與視角》(北京：大象出版社，2005)，頁 32-33。

2 魏思齊，〈美國漢學研究的概況〉，《漢學研究通訊》26: 2(2007.5): 33。

二、美國區域研究與現代中國研究的發展

美國的「區域研究」被認為是基於戰爭，特別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需要而產生的。與費正清等人創建區域研究的哈佛大學校長康奈特（James B. Conant）在1946年回顧時說道：

在戰爭期間我們為軍隊發揮的各種作用中，包括對於從佔領的區的司政官那裏送來的學生的培養工作。……它涉及一些國家和地區的語言、文化、地理以及經濟的研究。由於充分認識到這些研究方法具有很高價值，目前在研究生院中實施了多少與此相似相關區域研究計畫，另外一些計畫也正在規畫之中。³

這樣對戰爭有直接幫助的研究模式並不是一開始就設想好的，而是在原先學院區域專家中遍尋不著所需人才之後的應變措施。

1943年，美國的社會科學研究委員會（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 以下簡稱SSRC）的「世界地區小組」（The Committee on World Regions）寫了一篇題為「社會科學中的世界地區」的內部報告，談及由於戰爭的關係亟需對世界各地進行了解，但居於要職的學院專門人才卻對促進參戰地區的了解起不了甚麼大的作用，而這樣「缺乏能結合語言、區域知識與技術的專業科研人員」的情況，已嚴重影響戰爭機構的操作。基於戰爭情勢的需要，軍方決定自己進行培訓。⁴

美國軍方在二戰期間為了戰地需求，曾設計兩套區域培訓計畫（area training programs），一是為軍隊設計的訓練課程“Foreign Area and Language Curricula of the

Army Specialized Training Program”（ASTP-FALC），一是為管理佔領區域的文官課程“Civil Affairs Training Schools”（CATS）。課程內容包括地理學及人類學等學科領域的知識，強調實務及快速的學習，而非專業能力的培養，也就是此一區域培訓方案基本上「借鑒了地理學者對區域的概念以及人類學家對文化的概念」，但並不強調科學原理的內容，是「一個表面的、「務實」的民族地理學變種」。⁵即使這種綜合區域知識起初並無意於學科之設立，但這樣的設計卻成了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大學廣設的區域研究的雛型。

即使軍方在設立當時對如何達成世界各區域的了解尚未有清楚的整體規劃，但社會科學界對區域化的研究趨勢產生願景：「我們對其他國家廣泛知識的需求不會因停戰或重建而結束。無論以什麼形式的國際組織預設，美國將享有前所未有的機遇和重任。」⁶不管是戰時或戰後，基於美國的利益，對於其他國家知識全面的蒐集有其必要性。除了在報效國家的必要性上，學者認為區域研究取向在社會科學界也將綻放光彩：「社會科學的定律及世代與時間、地方及文化相關，很多都來自於地方的具體研究」，而「最具成效的成果往往是藉由比較的方法而得」，因此，「區域資料將在社會科學的應用下拓展及改善它的用途」。⁷原本時空、文化的差異對於社會科學尋求通則之目標無疑是一大挑戰，但藉由獲取個別地區的具體資料，進行比較，得以改善在追求通則時粗糙概化的問題，同時對於學科間的知識隔閡也產生溝通的效果。社會科學研究協會預期此一創新研究模式除了有益於國家實務之外，對於社會學科也有相當大的學術意義。⁸

3 James B. Conant, *The College Curriculum* (Harvard University), President Report.

4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 Committee on World Regions, *World Regions in the Social Sciences; Report of a Committee of the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 (New York: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 1943), pp. 1-2.

5 Fenton, "Integration of Geography and Anthropology in Army Area Study Curricula,"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Professors Bulletin*, XXXii, 1946, p. 706.

6 同註，頁2。

7 同註4，頁11。

8 同註4，頁11。

同年 12 月，哥倫比亞大學成立「區域研究委員會」(Committee on Area Studies)，同樣指出國內缺乏能勝任區域探索任務的人才(There will be need of many Americans who are thoroughly, exhaustively, and scientifically informed about particular neighbors)，⁹ 並提議具體的訓練模式為：對學有專長的科系研究生加以特定區域的知識訓練，以主修科系為縱軸，而個別地區的知識為橫軸，相輔相成。¹⁰ 並且與社會科學研究委員會(SSRC)的「世界地區小組」一樣主張，以拉丁美洲、中國及日本為首要研究區域。¹¹

區域研究就在軍方與學界的共識下應運而生。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所進行的區域研究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軍方主導的「敵情研究」，像是在日本敵情研究中，最基本的目的為訓練從語言入手去破解軍事密碼的人才，當時這批人才當中也包含了之後成為著名的中國研究專家的史華慈(Benjamin I. Schwartz, 1916-1999)。¹² 此外像是當時以「文化與人格」研究著稱的哥倫比亞大學人類學教授潘乃德(Ruth Benedict, 1887-1948)也曾受美國戰略情報服務處(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 以下簡稱 OWI)委託，展開對參戰國國民性格的研究，其中包括羅馬尼亞、荷蘭、德國(未出版)、泰國及日本等國，潘氏也因此成為第一位以人類學方法研究已開發國家的學者。

三、美國國內關於中國研究的辯論

曾為國家在戰時立下汗馬功勞的「區域研究」在二次大戰後獲取國家及大型基金會(洛克斐勒、卡內基、

福特等)的大力支持，在各大學更有規模地發展區域研究的相關課程、機構及計畫，使區域研究在 1950 年代已經成為各主要大學的創新學科。而以研究中國近代史起家及戰時曾為 OWI 工作的費正清(John. K. Fairbank, 1907-1991)與麥肯(Don McKay)等人早在 1946 年就組織成立了「國際與區域研究專門委員會」(Faculty Committee on International and Regional Studies)，並創立了他們稱之為「區域研究」的研究領域。¹³ 由於費正清從事研究中國近代史的背景，中國研究就成了他推動「區域研究」的核心內容，也成為將美國從傳統漢學帶向中國研究最重要的原動力，他將中國研究發展成與現實相關的學科，並通過國防預算撥款來進行此一工作。¹⁴ 當時涵蓋當代中國研究在內的區域研究機構如雨後春筍般設立。¹⁵

1960 年代現代中國研究逐漸成為顯學，美國學界開始思考現代中國研究的學科定位問題，1964 年 3 月 22 日於亞洲研究協會(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第 16 屆年會上的討論無疑是最具代表性的論戰。這次會議匯集了加州大學歷史學教授賴文森(Joseph R. Levenson, 1920-1969)、耶魯大學歷史學教授芮瑪麗(Mary C. Wright, 1917-1970)、康乃爾大學人類學教授施堅雅(G. William Skinner, 1925-2008)、普林斯頓大學中國研究教授牟復禮(Frederick W. Mote, 1922-2005)、哈佛大學教授史華慈及華盛頓大學教授蕭公權(Kung-chuan Hsiao, 1897-1981)等美國中國研究界的著名學者，同時亦邀請到英國倫敦大學政經學院人類學及政治學教授弗里德曼

9 Columbia University, "Preliminary Report of a Committee on Area Studies appointed by Dean George D. Pegram for the Joint Committee on Graduate Instruction, July 13, 1943," p. 3.

10 同註 2，頁 31。

11 同註 9。

12 同註 2，頁 31。

13 John King Fairbank, *Chinabound: A Fifty-Year Memoir*.

14 同註 2，頁 33。

15 華盛頓大學也在 1946 年建立了「遠東問題研究所」(Far Eastern Institute, 1949 年改組為遠東俄羅斯問題研究所)，哥倫比亞大學 1948 年在洛克斐勒基金會的贊助下成立「東亞研究所」；1955 年哈佛大學又組織進行「中國經濟政治研究計畫」(Chinese Economic and Political Studies)，之後在此一基礎上成立了「東亞研究中心」。根據 Barrett 的統計，大概有一百多個，見魏思齊，前引文，頁 33。

(Maurice Freedman, 1920-1975) 及英國倫敦大學東方和非洲學院漢學教授杜希德 (Denis Twitchett, 1925-2006) 與會。在探討現代中國研究與社會科學間的關係的同時，學者們亦就古典漢學向現代中國研究轉型之必然趨勢提出以下的說明。

施堅雅仔細地比較了傳統漢學與中國研究的差異，主要在三方面：一是美國過去漢學往往限縮於語言知識範圍，而中國研究則視語言為其分析主題的工具；二是傳統漢學研究往往已不具批判性地沉浸於中國文明，而中國研究則藉由與其他文明的比較，呈現某種程度的公正 (degree of impartial detachment which the comparative method implies)；三是漢學專注於中國的「偉大的傳統」，而中國研究則除了偉大的傳統之外，也研究區域的「小傳統」。在他看來，傳統漢學正被定義為多學科且具有清楚的研究目標的中國研究所取代。¹⁶

芮瑪麗則肯定傳統漢學過去的成就，但認為其所注重的都是一些「偏」而且「冷」的議題，因此未能在美國學術界發生重大的影響。而且中國的文化是「活」的文化，研究中國文化應該有「活」的史學；不應效法研究埃及和巴比倫等「死」文化的「東方學」。¹⁷ 其他學者對傳統漢學的批判則主要落在：傳統漢學在「專業化」上的不足。¹⁸

如果說區域研究是二次世界大戰的產物，美國現代中國研究則是針對二次大戰後所形成的冷戰格局所開出的藥方；而這樣的藥方是否全世界都樂於採用，則取決於當地學術傳統的主體性。

四、戰爭的勝利者等於學術的優越者？

二戰期間美國意識到承襲自歐洲的大學體系不能因

應當時世界情勢的發展，「區域研究」應運而生，而這樣的研究模式締造了學術與政治間完美的夥伴關係。美國大學為國家服務的義務在戰後如同戰時被視為理所當然，美國的社會科學研究委員會 (SSRC) 的「世界區域小組」主任 Robert B. Hall 提到區域研究設立的首要原因，乃是為了戰後國家的福利，大學對於教育美國公民成為世界公民的任務責無旁貸，而這在二次戰後成為美國科學研究的通例，「基本上美國整個科學研究屬於『國家利益』的政策……有一個執行的原則，叫做“Political Correctness” (政治正確)」。¹⁹ 在視大學為國家效命為理所當然的前提下，加上受到大學以外贊助者的青睞，²⁰ 原先被視為不得不的湊合，²¹ 成為戰後最為蓬勃發展的新科系。²²

美國區域研究除了在其國內積極展開發展外，也致力於此一模式的海外傳播。在美軍佔領下的日本，1946年1月建立了「中國研究所」，1951年在此一基礎上成立了「現代中國學會」。這兩個機構的核心成員主要是那些在二戰前和戰爭時期，置身於滿鐵調查部、東亞研究所等國策研究機關，而在二戰後帶著某種贖罪意識重開中國研究的學者。此一以日本本土中國研究為主體的組織體系，囿於其戰爭期間的參謀包袱，及其容共、左傾的立場，在戰後被迫依附和追隨美國的日本政府情況下，完全被排除在日本國策研究的可能性之外，並未被納入區域研究的範疇。²³ 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中期，對日本中國研究學界影響最大的是美國區域研究法的傳入，日本學界的組織和機構相繼採用美國區域研究方法，亞洲政經學會即為代表之一。而後，1958年亞洲經濟研究所成立，代表了日本政府作為國策取向的需要；1960年則成立日本國際問題研究所，由外務省管轄，是直接將區域研究作為決策基礎的體現。1962年福特基金會和

16 G. William Skinner, "What the Study of China Can Do for Social Science," p. 517.

17 Mary C. Wright, "Chinese History and the Historical Vocation," p. 513.

18 Kung-chuan Hsiao, "Chinese Studies and the Disciplines: the Twins Shall Meet,"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24:1 (1964.11): 112-113.

19 同註 2，頁 40。

20 Immanuel Wallerstein, "The Unintended Consequences of Cold War Area Studies," *The Cold War & the University*, p. 200.

21 John King Fairbank, *China Perceived* (New York: Knopf, 1976) p. 214.

22 Robert B. Hall, *Area Studies: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ir Implications for Research in the Social Sciences*, pp. 22-23.

23 加加美光行，〈現代中國學的新範式〉，《中國研究》第 5-6 期，頁 5。

美國亞洲基金會向東洋文庫捐贈鉅額資金，用於現代中國問題研究。在冷戰期間，日本的中國學界受到美國價值極大的影響，甚至形成國內親中、反中兩大派系。²⁴

相對於日本學界主流認同美國區域研究之意識形態及價值，在歐洲學者眼中區域研究卻是在研究方法及價值取向上受到相當大的質疑。1952年 *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Bulletin* 特別製作「區域研究」專刊，其中法國學者 Jean B. Duroselle (1917-1994) 認為區域研究的價值與其說是在社會科學上，還不如說是在外交政策上。²⁵ 當時任教於芝加哥大學的知名國際關係學家 Hans Morgenthau (1904-1980) 教授也表達類似的觀點，他認為區域研究根本就是以美國政治利益為主導的產物。²⁶

這種政治與學術結合的取徑牽涉到美國人二次大戰後自我認同的改變。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美國成為歷史上前所未有的政治、經濟及軍事強國，以往在文化、政治上附屬於歐洲的形象已不能滿足美國人的自我期許，二戰的勝利及戰後的繁榮使美國相信自己在國際舞臺上能扮演各種主導性的角色，這也涵蓋知識領域的範疇。區域研究正是在這樣的意識形態下發展起來。²⁷

當時美國學術界的看法是：殘破的歐洲不只是在未來國際政治舞臺上不再扮演重要角色，學術的傳統在美國也面臨被否定的危機，著名語言學家 Noam Chomsky (1928-) 回憶他當時在大學主修語言學和哲學的情形，教授們對於戰前歐洲的學術傳統或是略而不談，或是加上鄙視的評論，直到學生們有能力涉獵到教材之外的著作，才發現被斷頭的學科史。²⁸

抹煞歐洲在舊學科的貢獻，總不如開創真正的新學

科那麼令人佩服，而當代中國研究的創立被視為讓美國擺脫歐洲學術傳統的契機。1959年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 Howard L. Boorman 在《政治與社會科學院年報》(*Annals of the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中提出：「在這種情況下（共產黨的中國作為當代亞洲政治主要因素，及西方傳統中國研究以歷史與人文科學為主），美國大學目前有一個獨一無二的機會，發展對當代中國問題經驗及分析的研究方法，與擴大社會科學領域的使用。」可見在 1950 年代區域研究模式的當代中國研究已被視為美國推翻承襲自歐洲傳統漢學研究的最佳武器。「現代中國研究」的出現除了是呼應世界情勢所需的學科創新外，也是美國學者有意識地鄙視歐洲中國研究傳統的結果。²⁹

五、德國漢學研究的沿革

大陸學者李雪濤整理中國及歐洲德語地區學者的論述，³⁰ 將德國漢學歸納為四個時期：一是 19 世紀以前的「前漢學」時期，主要研究者是以譯介為主，有時顯得粗糙而簡單的時期，呈現業餘愛好者的水平；³¹ 第二時期則是 19、20 世紀之交，是德國漢學的醞釀及濫觴時期，「這一時期的漢學依然是隸屬於東方學系和普通語言學系的學科」；³² 第三個時期則是 20 世紀上半葉，在一系列大學學科及機構陸續設立下，德國漢學邁入專業化的時期；³³ 第四個時期則是二戰之後的恢復期。德國在歷經納粹期間「猶太籍的漢學家都被迫離職及出境」³⁴ 所造成「德國喪失了漢學界的巨大潛力」。³⁵ 二戰之後則有傅吾康、傅海波 (Herbert Franke, 1914-2011) 及葉

24 邵軒磊，《戰後日本之中國研究系譜》（臺北：臺灣大學政治學系中國大陸暨兩岸關係教學與研究中心，2009），第四、五章。

25 Jean B. Duroselle, "Area Studies: Problems of Method," *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Bulletin IV*, no. 4, pp. 636-38.

26 Hans Morgenthau, "Area Studies and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Bulletin IV*, no. 4 (1952): 647-51.

27 Noam Chomsky, "The Cold War and the University," *The Cold War & the University*, p. 171.

28 同註 27，頁 173-174。

29 同註 2，頁 33。

30 前人包括韓奎章、張國剛及高思曼 (R. H. Gassmann)。

31 李雪濤，《日耳曼學術譜系中的漢學——德國漢學之研究》（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08），頁 8。

32 同註 31。

33 同註 31，頁 8-9。

34 同註 1，頁 28。

35 同註 34。

乃度 (Eduard Erkes, 1891-1958) 等人分別在西德與東德致力於德國漢學的重建工作。所謂的「漢學抑或中國研究」的論辯即發生在此一時期。

德國漢學與中國研究的學科糾葛牽涉到公眾興趣的轉移，也牽涉到國際間知識界的權力關係。早在 1930 年代，第一位獲得大學漢學系教席的福蘭閣，或許是因為他早年在中國從事翻譯工作的經歷，與中國社會有實際的接觸，在當時就認為中國是變動的，而非靜止的，漢學不該只從事中國傳統文化的研究，也應該從事當代中國問題和局勢的分析，此觀點在當時以古代中國為主流的漢學系是相當特殊的看法，與東方學的學科定義有所不同。³⁶ 他的看法是超時代的，沒有其他外在條件的配合，終究未能引起學術界及社會的廣大迴響。1950 年代慕尼黑大學漢學創系主任海尼士曾與福蘭閣之子、也是漢學家的傅吾康展開漢學古今之辯，前者視中國為一古老文明，後者則努力尋找現代中國、現代歷史及當代中國發展的軌跡，而這樣的辯論在當時也只是被視為漢學家個人立場的不同，對漢學研究並未造成變革的動力。³⁷ 直到 1960 年代，德國境內對當代中國了解的迫切需求，以及美國區域研究典範下的中國研究也逐漸越洋推廣類似的研究計畫的風潮下，德國漢學界終於有了較大的動力去檢視東方學傳統下的漢學研究的優缺點。³⁸

六、美國區域研究與德國漢學的交鋒

在美國區域研究的全盛時期的 1960 年代，德國也興起對現代亞洲研究的需求，例如 1965 年大眾汽車基金會 (Volkswagen Foundation) 鑒於德國大學中所設立的傳統亞洲學科系不從事當代研究，而少數從事當代議題研究的經濟學、社會學系又缺乏語文訓練，不能深入探討問題癥結，開始積極籌劃德國境內的現代亞洲研究，成立亞洲事務委員會，隔年在漢堡又成立亞洲

事務研究所 (Institute of Asian Affairs in Hamburg)，1968 年德國東亞研究協會 (Deutsche Gesellschaft für Ostasienkunde—DGO) 成立，除了接受大眾汽車基金會的贊助外，福特基金會是最大的贊助者。在 1970 年代主要的推展成果為非亞洲學本科生開設中、日語課程 (1971 年起在波鴻魯爾大學辦理)、召開現代中國研究的大型國際會議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Continuity and Change,” 1973)，並出版中國手冊 (*China-Handbuch*) 及期刊。當時協會人員涵蓋外交、政治、經濟、學術及媒體各界人士，而學術界的代表不僅包括政治學家 Jürgen Domes (1932-2001)、Klaus Mehnert (1906-1984)，國際關係學家 Joachim Glaubitz、Gottfried-Karl Kindermann (1926-)，社會學家 Boris Meissner (1915-2003) 等社會學科的學者，也包括著名的傳統漢學家鮑吾剛 (Wolfgang Bauer, 1930-1997)、傅海波、林懋 (Tilemann Grimm, 1922-2002)、現代中國研究專家傅吾康及日韓學家 Bruno Lewin (1924-2012)、Herbert Zachert (1908-1979)。可見當時德國的現代亞洲研究似乎模擬美國區域研究模式展開，召集跨學科專家合作。但就其召集的成員看來，除了政治、社會學及法律等社會學科的學者之外，並不排斥傳統漢學、日韓學等人文學科傳統亞洲學學者的共同參與。³⁹ 除了漢堡亞洲學研究所的積極籌劃外，波鴻魯爾大學在 1964 年也「基於『區域研究』的總體設想，建立了東亞學研究院 (Fakultät für Ostasienwissenschaften)」。⁴⁰ 這一波 1960、1970 年代美國區域研究影響下的中國研究風潮雖不容小覷，但也引起德國傳統漢學研究者的批判。

1968 年 2 月慕尼黑大學漢學系教授、著名的德國漢學家鮑吾剛在東亞文化與語言學系落成典禮上的演講中提到當時德國傳統漢學面臨的問題，包括方法上專業化的要求，以及當代中國局勢變遷的挑戰，以及

36 張國剛，〈從外交譯員到漢學教授——德國漢學家福蘭閣傳〉，《國際漢學漫步》(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下冊。

37 同註 1，頁 33。

38 Wolfgang Bauer, “Chinakunde in Muenchen, Rueckblick und Ausblick,” *Jahre-Chronik 1967/1968 der Ludwig-Maximilians-universitaet*, p.117.

39 Werner Draguhn, “Die Deutsche Gesellschaft für Asienkunde - Brücke zwischen unterschiedlichsten Kulturen,” *Asien* 60 (Juli 1996): 7-15.

40 同註 31，頁 9。

傳統漢學及當代中國研究分道的趨勢及困難。⁴¹基本上，鮑吾剛是反對將漢學研究分為傳統漢學、現代中國研究兩個學門的。他的理由是：中國有其獨特的歷史傳統，今古一氣，很難一刀兩斷；此外，他也看見美國現代中國研究的問題，沒有中國語文的基礎，只是憑藉翻譯談論中國時事的風險，易流為無根之談，所謂的「即時」也是最易「過時」的。在當時傳統漢學與當代中國研究的十字路口，慕尼黑大學漢學系回應的作法是，加強學生口語能力，並支持漢學系與校內校外對中國研究感興趣的學者及機構的接觸與合作。在專業化及傳統與現代中國研究並列的要求下，漢學的一分為二似乎已是必然趨勢，但鑑於德國在漢學研究的資源上遠不及美國，如再作分散，只會更加削弱個別研究與教學的能量，折衷之道只能在現有的體制內儘量作開放，開放研究課題、開放研究方法、開放與所有對中國有興趣的學科學門間的合作。現代中國研究在當時的慕尼黑大學來說既可以是漢學系的一部分，也可以是國際政治學系的一部分，但都是依附於原有科系框架下，而這也是當時德國中國研究在 1960 年代以來的大致情況。⁴²

得力於大眾汽車基金會及美國福特基金會補助成立的亞洲事務研究所即使研究領域上近似美國區域研究的理念，在成員的邀集上卻是跨學科，甚至是跨出學術界、擴及媒體界，但對於屬於人文學科的傳統亞洲學專家並不排斥，甚至是佔絕大比例的，這與美國區域研究的觀念是有所不同的。

在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區域研究氣勢如虹地在國內海外迅速開展其對世界各地的研究，這波學術風潮的推動除了得力於政治勢力的結合，而廣納「世界上最優秀的學者」，並將「英語變成了唯一的科學用語」，更

使美國迅速成為國際間研究中國的權威。⁴³而被美國學界視為挑戰歐洲傳統漢學利器的「現代中國研究」卻始終未能獲得歐洲學者普遍的認同，以德國為例，學者認為模擬美國將傳統漢學與現代中國研究一分為二，弊大於利，德國大學選擇保留原先漢學研究的傳統體系，在研究課題朝現代延伸，而在方法上則不排斥跨學科的可能。⁴⁴「在 20 世紀 60 年代依照美國『區域研究』（Area Studies）計畫而建立起來的研究機構」——波鴻魯爾大學東亞學系（Fakultät für Ostasienwissenschaften — FOAW）在 1997 年主持人馬漢茂（Helmut Martin）過世後也「加快了其衰敗的速度」。⁴⁵德國大學中的漢學研究終究沒有複製美國區域研究概念底下發展出來的中國研究，即使在 1990 年代以後，在科隆（Köln）、杜伊斯堡（Duisburg）、特利爾（Trier）及柏林等地大學陸續設立標榜「當代」、「社會科學取向」、「針對實際」的中國研究科系，但在德國，如同在歐洲各地，這種美國區域研究概念的接受已較美國本土晚了三十年。而在實際的運作上，置身人文學科體系下的漢學研究還是與社會科學式的中國研究並行不悖。⁴⁶

美國區域研究模式的中國研究在德國始終無法立足，除了沒有美國報效國家的歷史脈絡外，中國研究在德國及美國被分置於人文或社會學科不同框架下，也導致德國難以複製美國的「中國研究」模式。置於歐洲東方學架構下的中國研究，始終以語文為出發點，強調中國特殊性，「如果說傳統的歐洲（自黑格爾和馬克斯·韋伯以來）喜歡用一系列負面因素描繪中國的與眾不同」；⁴⁷美國的中國研究則是奉社會學科的做法為圭臬，強調比較的重要性及追求通則的目的性，所以基本上「熱衷於強調東西方原則上是一致的」。⁴⁸人文或社會

41 同註 38。

42 同註 38。

43 顧彬，〈顧序〉，《日耳曼學術譜系中的漢學——德國漢學之研究》，頁 1。

44 同註 38。

45 漢雅娜，〈德國漢學的滄海桑田——中文版序〉，《德國漢學：歷史、發展、人物與視角》，頁 7。

46 Thomas Scharping, "Die sozialwissenschaftliche China-Forschung: Rückblick und Ausblick"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on China: Review and Perspectives), Cologne China Studies Online, No.1/2000.

47 顧彬，〈漢學路在何方——對漢學狀況的論辯〉，《中國圖書評論》2010.11。

48 同上註。

學科的不同屬性也使得德國漢學與美國中國研究最終還是分道揚鑣。

七、結 論

區域研究模式在二戰期間發揮提供戰略情報作用，成為美國「馬上得天下」的助力，使美國在二次大戰後政治、經濟及軍事上的霸權也瀰漫到國際知識界。因大戰期間興起的美國區域研究模式，在戰後受到美國學術界的認同及國家機構、私人基金會的大力贊助，在大學

中廣立門戶，成為美國學界的顯學，並成為國際知識界的明日之星。美國一方面監督背有侵略政治包袱的日本從事「學術民主化自由化」的反省，致力於學術與政治分離的改造，⁴⁹ 另一方面則鼓吹自己國內學術成為政治的延伸，而在外銷看似純學術區域研究模式的同時，核心卻是以美國為中心的政治利益。即使美國以其強大的期刊評審（Refereed Journals）和會議觀察員等機制，維護其所主張的政治正確性及西方漢學研究的主導性，⁵⁰ 美國社會科學式的現代中國研究最終還是遭到歐洲大學以人文學科主導的漢學研究體系所拒絕。⁵¹

49 邵軒磊，《戰後日本之中國研究系譜》，頁 129-130。

50 同註 30，頁 5。

51 同註 2，頁 40。同註 47。

Apply Now

漢學研究中心「外籍學人來臺研究漢學獎助」

※ 本中心獎助國外大學和學術機構之外籍漢學研究學者來臺研究

※ 提供經濟艙直飛來回機票乙張及每月研究補助費

教授級 NT\$60,000 副教授級 NT\$50,000

助教授級 NT\$40,000 博士候選人 NT\$40,000

※ 提供在臺獎助期間意外傷害保險新臺幣一百萬元（附加意外傷害醫療保險）

※ 研究期限：三個月至一年

※ 申請文件：1. 申請表 2. 簡歷表（含著作目錄） 3. 研究計畫 4. 推薦函至少一封

※ 截止日期：103 年 5 月 31 日（提出 104 年 1 至 12 月研究申請）

※ 如欲了解詳情，請洽漢學研究中心學術交流組或上網查詢申請

地址：臺北市中山南路 20 號 電話：886-2-23147321 傳真：886-2-23712126

E-mail: ccsgrant@ncl.edu.tw http://ccs.ncl.edu.tw